

“16—18 世纪海洋东亚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聂德宁

2013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2 日,“16—18 世纪海洋东亚史的史料、档案和研究者:成果与展望”(Maritime East Asia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16th-18th Centuries: Sources, Archives, Researcher: Present Results and Perspectives)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普罗奇达岛举行。此次会议由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主办,日本东京大学高级亚洲研究所、意大利罗马日本文化研究所、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中国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共同协办。来自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罗马、米兰,以及法国、荷兰、西班牙、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大陆、中国澳门的学者共 3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由研讨会发起人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白蒂(Patrizia Carloti)教授主持,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校长琳达·维嘉诺蒂(Lida Viganoni)代表主办单位致欢迎词。荷兰莱顿大学的包乐史(L. Blussé)在开幕式上做了题为《中国的海洋边疆:基于历史关系的一些看法》的主旨演讲。

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围绕着 16 世纪至 18 世纪的海洋东亚史的史料档案、海洋东亚史的专题研究、海洋东亚史与世界史的关联等一系列议题展开研讨。在提交的参会论文中,既有对史料档案文献的介绍和评述,也有对海

洋东亚历史具体问题的考察和研究,还有对海洋东亚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估和探讨。本文就此次研讨会的议题及其内容做简要综述。

一、史料与档案

就地理概念而言,“海洋东亚”涵盖了从东北亚至东南亚乃至南亚的沿海地区及整个太平洋西岸的广袤海域。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至中世纪的欧洲,这一海域被称为“东方海域”。意大利米兰的昂布罗修图书馆傅马利(Pierfrancesco Fumagalli)博士在其《“西方人”观念中的东方海域》(The Eastern Seas from “Western” Perspectives)一文中,列举了历史上欧洲和近东地区的史料、档案和地图等相关历史文献中有关东方海域的记载和描述,指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人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来审视和认知东方海域的。这一传统观念直到 16 世纪欧洲人陆续东来以后才逐渐有所转变。这主要体现在基督教传教士的著述和地图绘制中,如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与《坤輿万国全图》、艾儒略的《万国全图》和《职方外纪》等。他们所倡导的跨文化关系以及其对东方海域较为客观的认知和了解,时至今日依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来自意大利特伦托的卫匡国研究中心的米

歇尔·贾斯提诺威(Michele Castelnovi)和里卡多·思卡尔德奇尼(Riccardo Scartezzini),在他们提交的《超越海岸:作为欧洲制图知识转折点的卫匡国中国大陆地图》一文中,对16世纪中叶前往中国的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在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卫匡国用西式方法绘撰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 1655),不仅是当时欧洲人了解中国地理的必读之书,而且也是欧洲人有关地图知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不愧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

阿拉伯文本的史料及档案文献在东西海上交通史研究领域素来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罗伯特·托托利(Roberto Tottoli)教授的《伊斯兰教在印度洋的传播:史料与档案》对伊斯兰教在印度洋地区传播的相关阿拉伯文史料及档案文献做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述,引发了与会者莫大的兴趣和高度关注。葡萄牙是最早来到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欧洲国家。16世纪至17世纪,葡萄牙先后在印度的果阿、马来半岛的马六甲、中国的澳门,以及日本的平户相继建立了殖民贸易据点,与亚洲各国各地区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来自中国澳门大学的萨安东(Anto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教授在其《帝国的文书、外交文件、档案与16世纪至17世纪葡萄牙帝国在亚洲的声望》一文中,以大量的葡萄牙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考察和分析了16世纪至17世纪葡萄牙在亚洲各地的政治外交与商贸活动。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庞培乌法布拉大学的马内尔·奥耶(Ollé Manel)教授的《海洋东亚:西班牙人的视角》一文,从西班牙文史料及档案文献中梳理和勾勒出16世纪至17世纪西班牙人对海洋东亚的认知过程与印象。

二、海洋东亚史的专题研究

16世纪至18世纪海洋东亚的研究领域涵盖了许多方面的专题研究课题,从提交此次研

讨会的诸多论文来看,不仅有对这一时期海洋东亚各地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经济的考察,也有对这一地区各国、各地区间政商往来的探究,还有对当时欧洲人在海洋东亚地区政经活动的研究。

法国远东学院柯兰(Paola Calanca)博士的《16—18世纪的厦门》一文,以厦门的碑刻资料为依据,考察和分析了明清时期厦门的海防建设与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的互动方式,从中揭示了厦门从一个海防重镇逐渐发展为商贸都市的变化轨迹。厦门大学聂德宁教授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中国帆船的东南亚贸易》一文,考察和分析了18世纪末中国帆船对巴达维亚、马尼拉贸易的衰退和19世纪初对暹罗、安南以及新加坡贸易兴盛的原因,指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对于中国帆船的东南亚贸易而言,可谓是一个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时期。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庞培乌法布拉大学的乌瓦尔多·亚卡里诺(Ubaldo Iaccarino)博士,在其《“日本朱印船”项目:1596—1615年庆长时代德川家康与马尼拉西班牙人的合作尝试》一文中,通过对德川幕府初期日本朱印船与马尼拉西班牙人殖民地贸易活动的考察和分析,探讨了当时日本与马尼拉之间贸易往来的方式与内容。日本东京大学松井洋子的《长崎:近代早期日本贸易港口的社会结构》一文中,对长崎这一日本锁国后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长崎港的建立及其社会组织的构建旨在服务于对外贸易,尤其在17世纪末德川幕府实行贸易限制政策以后,长崎港是以利益均沾而非相互竞争的方式通过其市政组织机构来操控对外贸易的全过程。

东南亚地区是海洋东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海洋东亚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日本东京大学島田竜登教授在其《巴达维亚可作为世界贸易中心吗?从亚洲和全球视角看印尼的主要贸易港口(1619—1799年)》一文中,对巴

达维亚港口的优势与劣势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巴达维亚的地理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当时亚洲区域内的一大贸易中心;即使到了19世纪初,巴达维亚的转口贸易已趋于衰落,但它依然保持着东南亚区域内的贸易中心地位。日本北海道大学守川知子的《17世纪伊朗什叶派穆斯林眼中的暹罗宫廷文化》一文,在考察纳莱王时期(1656—1688年)暹罗的对外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对暹罗的阿瑜陀耶王朝与波斯的萨菲王朝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对暹罗的宫廷文化和外交礼仪的内涵进行了分析,从中探讨暹罗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中国澳门大学杉山晶子(Sugiyama Akiko)博士的《16—18世纪东南亚岛屿中的女性与海盗》(Women and Maritime Piracy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between the Six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一文,考察和分析了这一时期活跃于东南亚岛屿间的海盗组织的构成与形式,进而以女性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探讨妇女在海盗这一特殊群体中所具有的女性兼海盗的双重角色特征。另一位来自中国澳门大学的菲利帕里贝罗·达席尔瓦(Filipa Ribeiro Da Silva)博士,在其《16世纪五六十年代葡萄牙人进口到里斯本的“印度黑奴”》一文中,对这一时段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奴隶贸易活动进行了量化考察,从中分析和探讨了葡萄牙人从事的东印度奴隶贸易的贩奴数量、贩奴贸易商的类型,以及贩奴贸易的投资与经营规模等相关问题,指出奴隶贸易也是构成葡萄牙人东方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海洋东亚史与世界历史的关联

15世纪末以来的地理大发现以及其后新航路的开辟,无疑是世界历史“从地区史到全球史”的一个分水岭。16世纪至18世纪的海洋东亚史与世界历史的关联也是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之一。

中国澳门大学郝雨凡教授在《澳门在早期东西方交往中作用:发展澳门学的学术探讨》的

论文中,不仅考察了澳门在早期东西方交往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还对发展澳门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了进一步的学术性探讨。英国斯旺西大学休·鲍文(Huw Bowen)教授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海洋东亚:1600—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航海贸易活动》一文,充分利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方文书、商馆日志、董事会议记录、各种游记、私人书札和商船航行记录等史料和档案文献,对英国东印度公司230余年的航海贸易史历程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指出海洋东亚是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海洋世界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美国亚特兰大艾莫利大学的托尼奥·安泽莱德(Tonio Andrade)教授的《全球史中的郑氏与荷兰的战争》(The Zheng-Dutch War in Global History)一文,将1661年郑成功打败荷兰人收复台湾的战争置于全球史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从中探讨中国的军事创新与世界军事变革之间的关联性。

当前,世界历史研究领域有关区域性海洋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呈现,这在本次研讨会中也有所体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铃木英明(Suzuki Hideaki)博士的《海域史向新世界史迈进的潜力与限制:区域划分的局限性,中央凹与超中央凹视觉》一文,尝试对东亚海域史是否能够突破国家历史的界限乃至东亚区域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指出只有将区域性视野与全球性视野合二为一,才有可能成为海域史向新世界史迈进的最佳途径。同样来自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格温·坎贝尔(Gwyn Campbell)教授,在其《印度洋世界史研究的现状》一文中着重强调了印度洋沿岸区域史的重要性,指出印度洋世界处在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涵盖了非洲东部、西南亚、南亚以及东南亚沿海的广大地区,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此次研讨会还就共建未来的海洋东亚史研究平台提出了一些极富建设性的建议,并进行

了周密的规划。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有必要在时机成熟时成立一个海洋东亚研究国际学会,创设《海洋东亚研究》的国际学术刊物,使之成为集中展示海洋东亚史研究最新研究成果和传播海洋东亚史研究学术信息的最佳平台。与会专家学者还提议,可定期举办有关海洋东亚研究的暑期学校或硕士课程班,轮番选读各文种的相关史料和档案文献(诸如中、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法、拉丁或意大利文),并以此为基础,在相关的研究机构和大学中设立海洋东亚研究课程的国际博士项目。远期目标是构建一个世界海洋史研究者之间相互交流合作的桥梁,研究领域可从东亚海域扩展至印度洋和

地中海海域,并以此为纽带连接各个区域海洋史研究,同时将研究的触角扩大至19和20世纪乃至当代的世界海洋史研究领域。最后,主办方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东方大学郑重宣布,拟创设一个永久性的海洋专题研究项目,计划联合各国、各地区相关学者进行国际性的合作研究,其重点是对东亚海域与地中海海域进行比较研究。

[本文作者聂德宁,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徐再荣)

· 书 讯 ·

《古代近东文明——古代两河流域、埃及、波斯等古文明探研》出版

《古代近东文明》,西南大学李海峰教授编著,科学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近东地区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古文明,然而这些古文明大多属于“死而复生”的文明,世人对这些古文明的具体内容所知甚少。该著作是国内第一本详细介绍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波斯文明、赫梯文明和古犹太文明等五大文明板块的著作。该著作细致地梳理了亚述学、埃及学、赫梯学等学科的诞生、发展史,重点介绍了五大文明板块所取得的辉煌文化成果。该著作颇具新意,在国内首次翻译了历史上第一部法典《乌尔那穆法典》及《新巴比伦法典》的全文,对古埃及的历史分期采用了国际最新的分期方法,对“巴比伦之囚”时期犹太人在两河流域的生活进行了较详细的描述。此外,为了增强著作的可读性,作者书中引用了200多幅图片来帮助读者更加深刻地理解相关内容。该书可谓是一部新意颇多、雅俗共赏的古代文明史著作。(峰)